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 王哲伟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笔者认为，这一战略部署，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深远考量，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入理解其重大意义，需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解其战略价值并明确实践路径。

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择

从长期看，一国经济的根本趋向是在内部实现供需平衡。当其通过供给效率的显著提升确立生产优势后，强大的生产能力将使其积累巨额财富（表现为贸易顺差），进而推动内需上升，直至达成内部供需平衡；反之，一旦一旦丧失供给优势导致财富外流（表现为贸易逆差），其内需也将随之萎缩，最终回归供需平衡。这一动态平衡过程，往往伴随着全球主导国家的历史性更迭。例如，19世纪凭借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的美国，在20世纪初被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美国、德国超越后，贸易顺差转为逆差，最终失去其世界主导地位。

当今世界，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0%以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其独特优势不仅源于超大规模体量，更体现在衍生的产业配套与产业集群效应，让产业链兼具其他单一经济体难以企及的低成本与高灵活性。相比之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其最终消费支出常年占据全球消费总额的25%以上。其庞大的内需体系不仅支撑其国内经济持续增长运转，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

美国之所以能在长期逆差下维持高消费及其全球主导地位，核心在于建立了以“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为支柱的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美国用美元向生产国购买商品，生产国用得到的美元向资源国购买石油等大宗资源，资源国再将收到的美元投资回美国金融市场（美债、美股），这一循环机制，与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相结合，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持续通过“印钞发债”和“美元潮汐”等金融操作获取高额利润，这是美国可以在长期贸易逆差情况下维持其高消费率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导致其金融资本回报率远高于产业资本。其直接后果是美国制造业持续外流，先后流向欧洲地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并最终流入中国。这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供需结构的长期失衡，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面临着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严峻挑战。

然而，深入剖析历史进程便会发现，长期供需平衡的规律并未真正失效，其强大的约束力正以新的形式重新显现。当前，美国依靠金融主导地位维系的结构失衡难以持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内在脆弱性，自此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至2022年俄乌冲突



●**核心观点：**中国虽拥有全球最完整高效的工业体系，但过去长期依赖外部市场消化产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唯有做大做强国内市场，让内部消费与有效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供需失衡局面。此举旨在避免因内需不足而制约我国供给端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后，美国将美元金融体系频频“武器化”——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将俄罗斯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等行为，进一步动摇了美元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信用基石。叠加美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显著加速。至2025年第二季度，全球央行（不含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总值自1996年以来首次超过持有的美债规模。2025年以来，美国再度对华和其他各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其战略意图明确：利用其“全球最大消费国”以及其在金融、科技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通过加征不对等关税，迫使他国投资美国和转移关键产业至美国本土等手段，重振本土制造业，打造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不仅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也是“大幅提升供给能力，重构供需平衡”的必经之路。从当前中美经济走势看，谁能率先在国内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均衡，谁就将在未来大国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中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使命

基于上述历史规律与当前变局的洞察，中国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导向，其必要性及战略意义更加清晰，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层面：

破解“生产消费”结构性矛盾，是重塑发展主动权的根本路径。中国虽拥有全球最完整高效的工业体系，但过去长期依赖外部市场消化产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唯有做大做强国内市场，让内部消费与有效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供需失衡局面。此举旨在避免因内需不足而制约我国供给端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释放“十亿级”市场潜能，是推动供需高水平良性循环的战略支点。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超过4亿且仍在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统一大市场。过去的消费群体集中在生产端，而当前战略的关键在于将巨大的人口规模从“生产力要素”转化为“消费主体”，激活这一潜能，既能有效承接国内强大的供给能力，又能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反向激励供给侧改革，驱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抵御外部系统风险，是夯实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建

立在美元主导地位之上的国际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加剧。坚定扩大内需，是支撑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举措。强大的内需能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效保障就业，为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宝贵的战略缓冲空间；同时，也能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增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与挑战

将扩大内需的战略蓝图转化为现实，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多重结构性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消费能力低：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格局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发展速度，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有限、速度较慢，形成“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饱和、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城乡与区域间消费能力差距（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50%）进一步加大了全面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难度。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家庭“刚性支出”负担较重——特别是对于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但还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待遇的3亿新市民群体——会持续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空间，抑制整体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意愿弱：预期转向与消费提振的关键障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强、国内部分行业转型阵痛凸显的背景下，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趋于谨慎，尤其是青年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不敢消费”的心态。尽管2025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呈现回升态势，但仍未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扩大内需的系统路径与实践方略

立足当前经济现实，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动能，关键在于做好顶层设计与系统性推进，具体应聚焦以下四个维度：

稳就业促增收，筑牢内需发展基础。一是以高质量就业推动收入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附加值产业及其催生的高收入岗位长期由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垄断，构成了其强劲消费能力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国已在新兴

源、人工智能、储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领域形成一定优势。为此，建议双管齐下：一方面，引导公共资本和民间资本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及配套服务体系的投入，以支持关键技术突破，助推重点产业升级，催生出更多高质量就业，进而衍生出更多高端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一是以“反内卷”为导向优化劳动力市场。引导企业合理管控工时，推广弹性休假与灵活办公，强化劳动权益保护，在增加总就业岗位的同时，为在岗劳动者释放更多休闲与消费空间。二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其核心在于建设健康、成熟的资本市场，推动股市健康发展，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稳步入市，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与入、退市和分红机制，严厉打击违规减持、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增加居民财富，也能提升社会整体投资效率，引导资金投向关键领域，助力收入和内需的可持续发展。

强社保消顾虑，释放国内消费潜力。一是强化教育与育儿保障。践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论断，着力提升各阶段教育质量，适时考虑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并合理增加职业技能课程，强化兴趣导向与生涯规划，推动人尽其才、精准育才，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结构性优化。同时，大幅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覆盖，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举措制度化、体系化。二是强化住房、养老与医疗保障。加速保障性住房与公租房体系建设；全面加强街道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并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地级市；深化医保跨区域统筹，显著提升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与覆盖范围。

抓重点拓群体，挖掘内需增长新空间。针对新市民与农民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一是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支持农民通过宅基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入股等市场化方式，提高其财富量和财产性收入。推进城中村改造，做好货币化安置工作。二是针对新市民群体，在保障房和公租房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如提供5-10年稳定租期与优先续租权，鼓励其对租住环境进行个性化投入；全面落实“租购同权”，保障其子女平等享有就近入学的权利。三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更多技术型就业岗位，提升农业效率。

促改革增动能，激发地方政府活力。通过制度性改革，调动地方政府扩大内需的积极性与能力。一是持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压力。探索通过发行低利率的中央政府债券，置换部分高利率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效减轻地方利息负担，使其“有钱办事”。二是深入推进消费税等税制改革。将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端移至零售端，并将收入相当部分划归地方财政。此举既能直接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也能激励地方政府更积极地优化营商环境，拉动本地消费，使其“有动机办事”。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沉浸式文旅要做好三种“沉浸”

□ 钟晟 林椿苓

近年来，文旅市场蓬勃发展，文旅业态不断上新，其中，沉浸式文旅演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旅新业态，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发挥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并指出要“推出一批沉浸式文旅新产品新场景”，为地方文旅实践提供创新路径。

沉浸式文旅通过技术赋能与场景创新，将特色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立体沉浸叙事，它反映出在体验经济时代，游客的文旅需求已从观光打卡转向对深度体验与情感共鸣的追求，渴望走进地方故事，融入当地文化场景，获得个性化、互动化、情感化的体验与精神满足。然而，当前，许多文旅项目在规划设计上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景观打造、活动形式、消费业态等方面千篇一律，难以突显鲜明的地方特色，也不足以给游客带来印象深刻的体验。基于地方文化打造成功的沉浸式文旅项目，要着重做好以下三种“沉浸”。

场景化的空间沉浸

场景化的空间沉浸强调游客在特定空间场景中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它的核心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主题，反映特定年代、文化背景与生活情境的文旅空间。这种文旅空间是一种建构出来的具有超现实意义的空间，它来源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可以根据某种文化主题进行创造。游客进入这种文旅空间，则意味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短暂脱离，进入到具有异质文化主题的超现实世界。游客的感知系统与场景化的空间营造形成互动，使游客的认知、身体与情境融为一体，进而形成深度的场景化空间沉浸。

场景化的空间沉浸营造要注重融合特定主题下的文化背景、时代特征，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装饰、语言、非遗等文化元素符号，形成浓缩式展演地方的文旅空间。在文旅空间内则借助特色布景、装饰设计、服装造型、音乐旋律乃至气味氛围等多元媒介，赋予场景动态生命力，有效激活游客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等多重感官通道，强化其全身心的参与感，从身体的感官体验逐步过渡到精神的深度融入，构建起游客对特色文化主题的深度体验与情感联结。

●**核心观点：**沉浸式文旅通过技术赋能与场景创新，将特色文化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立体沉浸叙事，它反映出在体验经济时代，游客的文旅需求已从观光打卡转向对深度体验与情感共鸣的追求，渴望走进地方故事，融入当地文化场景，获得个性化、互动化、情感化的体验与精神满足

长沙文和友将上世纪80年代的老长沙市民生活场景成功地浓缩并再现于现代商业建筑之中，仿真复刻错落曲折的老长沙街巷布局、布置杂乱的铁管道、水泥横梁、贴满小块白瓷砖的水泥外墙等建筑细节，并搭配搪瓷缸、缝纫机、老式缆车等具有时代印记的物品，突显非常具有年代感的老年长沙生活场景，打造出高密度的怀旧文旅空间。在此基础上，引入传统小吃店铺叫卖、魔术屋表演、老式录像机放映、非遗手艺人展演、胶片艺术展览等互动动态，在静态的物理空间融入动态的、可参与的生活体验。游客进入文和友空间，能够真切体会到老长沙的市井烟火与生活方式，唤醒具有浓郁怀旧情感的记忆集体。

此外，沉浸场景的营造还需要充分运用数字化的空间表现技术与交互装置，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交互设备、裸眼3D、全息投影等，通过打造虚实融合的场景与具有新奇感、趣味性的沉浸式体验，丰富游客的身体互动与情景融入，拓展文旅空间对特色文化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故宫主题沉浸式艺术展《画游清明上河》通过全息投影、裸眼3D、8K超高清数字互动等技术，将静态画卷转变为动态可感的沉浸场景，观众可“走进”画中仔细感受北宋汴京街市的繁华景象。

亲历感的戏剧沉浸

沉浸式文旅超越了传统的“观看式”游览，将文旅空间构建为一个富有张力的叙事场域，空间动线、故事情节与游客行动能够巧妙串联并融入预设的叙事框架中，从而实现更加富有感染力的沉浸式设计，为游客营造进入叙事剧情之中的沉浸感。

沉浸式文旅的戏剧沉浸设计以地方神话传说、历史名人事迹、民俗风情、民间传说等内容为主题，将叙事框架所涉及背景、事件、角色与情节线索融入文旅空间，并通过不同游

线的组合，引导观众在戏剧化的虚拟情境中形成亲历者般的感知体验。游客在不同空间转换中持续发现新的情节线索，增加叙事展开的层次感与趣味性，并在剧本情节与叙事场所中解读地方文化符号，进而连接叙事片段，构建出层次丰富、动态变化的沉浸剧情。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加深游客对特定主题故事的整体理解，而且强化了游客对文化主题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

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的大型实景沉浸式项目《大唐不夜城》，以唐代长安的市井生活为背景，将故事主题设定为太上皇李隆基重回长安，因对杨玉环相思成疾，为再见杨玉环一面，遍邀天下名士会聚临街坊，以此进行戏剧沉浸式的体验设计。游客玩家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游览空间中“坊市”“宫阙”“里巷”三大区域，体验歌舞演艺、游戏竞技等传统活动，穿插触发主题多样的人物故事，在沉浸式的戏剧体验过程中自然地加深对唐朝名人、风物特产、唐风建筑与服饰等文化符号的理解，并对西安的大唐气象与文化产生更深层的认知与共鸣。

参与式的角色沉浸

在沉浸式文旅项目中，游客不再作为旁观者去欣赏预设好的特定文化主题表达，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开放性的叙事框架，赋予游客特殊的角色身份，承担着特定任务，使游客在参与过程中，不自觉地自我情感与认知投射于角色之中，形成强烈的角色认同，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身份，全身心投入为其设定的角色身份之中，由此获得深层次的沉浸体验。游客不仅是参观者，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动书写者，通过角色沉浸参与到叙事建构中，共同塑造故事进程，在与文旅空间的互动中收获高度个性化的角色沉浸体验。

为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能动性，沉浸式文

旅项目将文化主题内容拆解为动态的、可供探索和塑造的故事素材与线索，从而构建具有游戏化特色的体验情境，通过有机整合文化主题与玩法，鼓励游客在情境中主动探索与互动，自主代入角色、融入故事。例如将特定主题的历史故事、文化遗产、风物特产巧妙地转化为游戏目标、谜题线索、关键道具或任务节点，供游客交互并发挥自身的行动、决策与想象力，并由不同的选择和行动触发多样性的剧情分支，以持续激发游客深入了解特色文化的兴趣与动力。同时，发挥互动角色NPC连接游客与故事内容的作用，以立体鲜活的形象与游客交流对话、合作任务，通过深度互动增强游客角色沉浸感。

山东临沂沂南县红嫂家乡旅游区推出的沉浸式红色文旅体验项目“跟着团长打县城”迅速走红，成为现象级文旅IP。该项目以1941年军民齐心协力解放沂州城的战斗历史为蓝本，通过场景复原、角色扮演、剧情互动等方式，让游客们以“抗日战士”的身份，手持道具武器冲锋陷阵。游客们热情高涨，充分投入沉浸式文化场景，在沉浸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加深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理解，唤起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综上所述，沉浸式文旅作为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全景式的场景构建，富有深度的故事构建，高能互动性的参与参与，为游客营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将抽象的文化主题转化为沉浸式游客身体的感知体验与情感认知。沉浸式文旅不仅重塑游客与地方文化的互动关系，更在深层次上激活了地方特色文化主题的现代生命力，为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范式。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沉浸式文旅还将进一步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不断丰富文化主题内涵的呈现维度与交互深度，创新游客的感知、参与和体验形式，优化多样化的叙事路径与模式，赋予优秀文化主题以动态化、青春化的表达方式，将沉淀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中的文化元素创新转化为具有趣味性、故事性、启发性的当代表达。沉浸式文旅项目能够唤醒民族集体记忆、形塑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更多的活态场景，成为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有效路径，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要求全党上下“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品质，强调尊重历史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是中国共产革命创造百年辉煌的成功密码之一。面对当前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现实环境，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肩负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任任务。

□ 邓帅

要坚定做到对党忠诚。坚持党的领导，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出发点。历史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始终坚持历史主动精神所取得的正确结果和巨大成就。这同时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对于广大干部而言，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到对党忠诚。对党忠诚，要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深刻的理解与认同，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我们党对“十四五”发展经验总结和对国内外形势研判研究之后，对“十五五”所处历史时期的基本判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突破、全面提升，强化优势、弥补劣势，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要自觉坚持清正廉洁。党员干部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清正廉洁作为为官的基本底线，经由人民主体性而成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要求。纵观历史，历史主动精神中始终内蕴着人民至上理念，表现为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集体智慧、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具体而言，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苦难以及人民的巨大力量，各位革命先驱才作出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定；正是因为紧紧依靠人民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成功应对“摸着石头过河”中的各种艰难险阻；而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历经百年仍然风华正茂。“十五五”时期所要遵循的六项原则中，将“十四五”规划中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上升为“坚持人民至上”，从而更加凸显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民立场，对党执政用权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当前更为严峻的风险挑战，广大干部不仅要正确用权，更要用心用权、高效用权，做到转化升级版的“清正廉洁”，将党的优势、我国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其中，正确用权是基础，用心用权和高效用权是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升级。首先，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是我国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遵循，要求干部在党纪国法以及自身职责范围内，运用权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消除官本位思想，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功利主义、公私分明、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其次，人民至上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干部用权不仅要讲“情”，还要讲“效”。面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等发展难题，广大干部要对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报以关切的心态，急百姓之所急、忧民生之所忧，真正自觉做到工作中“用心用权”为人民服务。而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社会治理难题不断涌现等问题，干部用权必须高效，不仅要讲运用取权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方式方法，还要更加追求用权的成效，加大对干部权力运用结果的科学化考核，并将其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以此激发广大干部能用权、会用权、用好权。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要勇于担当作为。担当作为是历史主动精神的本质要求。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扛起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旗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和无产阶级可参照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富起来”；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勇担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更自觉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重任，展现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全力推动中华民族“强起来”。当前面对发展的种种难题，尤其需要干部发挥担当精神，以主动作为赢得发展机遇。具体而言，发扬斗争精神，将其作为解决矛盾、转化矛盾的根本方法，干部要敢于迎接挑战和困难，敢于与敌对势力硬碰硬，勇于接受挫折和失败；发扬奉献精神，将其作为坚持人民至上的鲜明体现，干部要始终将自身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后，为了人民利益甘愿牺牲自身利益，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就要坚定地去推进；发扬实干精神，将其作为推动发展的不二法门，干部要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联系到一起，既有滴水穿石的韧劲，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扎扎实实的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副教授】